

從澳門蒐集的瓷片看中國出口瓷

馬錦強*

15世紀到16世紀初明末期間中國陶瓷在歐洲大受歡迎。為滿足市場所需，從西方東來採購的商人不斷增加，各國為着自身的利益在東亞等地角力。1553年葡萄牙人租借澳門定居，用盡一切手段排斥所有外來者，企圖壟斷中國的龐大市場。大量的陶瓷製成品經澳門運往世界各地，數百年過後在澳門還能找到遺留下來的瓷片，從這些瓷片的一鱗半爪可以看到當年澳門作為重要轉口港的一斑。本文題目採用“蒐集”而不用“發掘”是因為文中所談及的瓷片，是當年由一群業餘愛好者偶爾在倒塌的山坡地採集得來，而非正式的考古發掘，因此作者訂名為“蒐集”而非“發掘”。

中國陶瓷在外地

明代早期鄭和七次下西洋對中國文化及產物的向外宣揚，起了一定的作用。大量中國的物品隨船隊出發，中國的陶瓷在當時所經的國家大受歡迎，需求甚殷。此外，成書於1298年的《馬可·波羅遊記》在15世紀刊印，藉着這書的流傳，馬可·波羅成為系統地把中國和亞洲介紹給西方的第一人，這對歐洲人渴望對東方有更多的瞭解及促成日後歐洲航海事業發展有着重要的影響。

中國陶瓷早期在歐洲是一種昂貴的東西，祇有皇室與貴族才能享用，陶瓷器的生產過程對當年的歐洲人來說更是神秘莫測。直到康熙年間，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昂特雷科萊(d'Entrecolles)神父在1712年及1722年於景德鎮寫給身處歐洲的奧日(Orry)神父兩封信，詳細介紹了景德鎮中國陶瓷的製造過程。信中談到輸往歐洲的中國瓷器昂貴的原因；同時亦談到景德鎮當時擁有一萬八千戶人家，人口達一百萬，日耗一萬多擔米和一千多頭豬，景德鎮的物價指數比鄰近的地方為高，但富有人家亦相對比較多；當進入景德鎮港時，看

到各處嫋嫋上昇的火焰和煙氣，構成了幅員遼闊的輪廓；到了晚上，這座城鎮好像是被火焰包圍起來了那樣，活像一座有許多煙囪的大火爐。信中還提到輸往歐洲的瓷器差不多全部都是按照來樣燒造的，樣式通常很奇特，製造起來很困難，而且成功率很低；這些產品稍有毛病就會被歐洲人拒絕，因為他們並不想要任何不完美的東西。這些不成功的瓷器最終成為生產商自己手中的存貨，因這類產品亦不合適中國人的口味，所以很難在國內脫售。⁽¹⁾

陶瓷器不單在歐洲受歡迎，中國北方的女真族對陶瓷器亦大量需求，不惜以任何手段獲取。《明英宗實錄》卷四十九中有如下記載：“明正統九年(1444)正月丁卯(二月五日)宴請海西女真族，因官員疏於職守，在宴後發現失去碗、碟等器達五百八十三件。”⁽²⁾由此可見中國瓷器在各地的受歡迎程度。

1604年(明萬曆三十一年)，一批中國瓷器在荷蘭拍賣，法國國王亨利四世購藏了一套中國製的餐具；1632年瑞典國王首次接觸中國瓷器後開始收藏，成為歐洲上流社會大量模倣的對象。⁽³⁾

* 馬錦強，藝術系學士，歷史系碩士，現任澳門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委員。

當時歐洲上流社會的消費模式以“中國品味”的產品為時尚，購買者採購中國瓷器作為個人玩賞或向別人炫耀的心理需求顯然大於實用需要。在陶瓷外銷史上，輸往不同市場貨物的精粗常有差異：銷往歐洲等地的往往以精美的細瓷為主，以供歐洲上流社會作為收藏及欣賞之用；而輸往東南亞、南亞等地區則以日用粗瓷為主。元代航海家汪大淵於元至正九年（1349）所著的《島夷志略》提到：“東南亞國家所需要的瓷器主要是青瓷、粗碗等物。”而在《景德鎮陶瓷史稿》一書中有如此的記錄：“粵省商人，與洋商接近，則所銷瓷器，均須上品。”⁽⁴⁾細瓷與粗瓷需求的差別可以在東南亞的陶瓷考古發現與歐洲博物館展出的外銷瓷作出明顯的比較。

據統計，從1974年到現在的三十多年間，單在暹羅灣附近的東南亞海域發現的沉船約有一百二十艘，而這些船隻在海底數百年甚至上千年，而伴隨出水的絕大多數為陶瓷器。⁽⁵⁾有一艘船1610年便運載了九千二百二十七件瓷器到荷蘭，1612年運載三萬八千六百四十一件，1614年上升至六萬九千零五十七件，1636年二十五萬九千三百八十件，1637年二十一萬件，至1639年達至三十六萬六千件。⁽⁶⁾每年有大量商船往來歐亞兩地，從明末到清初由中國出口到歐洲各地的瓷器每年達三百萬件⁽⁷⁾，由此可估算中國陶瓷出口量的龐大。

到19世紀初，歐洲人掌握了製瓷技術，中國瓷器出口數量比往日大大減少。當中國生產的瓷器第一次經好望角運往歐洲時，出售的價值不菲，利潤十分高。但當歐洲人開始自己生產足以抗衡中國的產品後，中國商人改變了瓷器出售的策略，以整套要價，一套二百七十件的餐具價格由十二至七十五兩，一套二十件的早餐器皿售價三兩，一套完整的一百零一件茶具售價由十一至十三兩，一套四十九件的茶具售價五六兩。這樣的改變對中國陶瓷的產出市場有一定的推動力。⁽⁸⁾

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的早期關係

15世紀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在中歐崛起，勢力強大，佔領了巴爾幹半島、小亞細亞、南高加索、庫爾德斯坦、敘利亞、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島部分地區及北非大部分，版圖跨越亞、非、歐三洲。因戰爭不斷，西歐諸國往東方的路線受阻，奧斯曼帝國向過境商人強徵高額稅收，因此西歐國家為求自保及國內物資所需，紛紛開拓往東方貿易的新路線，其中葡萄牙及西班牙為最早開創新航線的兩個國家，而荷蘭則為後續加入者。

在歐洲出售東方的商品利潤豐厚，使西歐各國專門組成自己的東印度公司及船隊向東方航行，除了在印度等地採購大量的香料外，更向中國買入不少貨物，如茶、生絲和瓷器等。茶與生絲等物不像瓷器一般可作長時間的保留，因此，瓷器便成了西方人來華貿易的佐證物。

1487年葡萄牙船隊由大西洋向南啟航，同年到達好望角；十年後葡萄牙人華仕古·達·伽馬繞過好望角，穿過印度洋到達印度南部的一個城市卡利卡特(Calicut)。1517年，葡萄牙人由馬六甲啟航至中國，並由珠江口直入廣州。西班牙人則由大西洋向西航行，發現了美洲大陸，並從墨西哥橫越太平洋，經菲律賓到達東亞。這兩個航海大國分別佔領了向南及向西的海上航線。

1580年西班牙吞併了葡萄牙，而早在1555年西班牙已統治了荷蘭。1568年因西班牙管治荷蘭不善，國內發生內亂，1648年荷蘭最終分裂為南北兩部分，西班牙繼續統治荷蘭南部，而北部則建立北荷蘭共和國。

從1568年至1648年西班牙統治葡萄牙期間，正值與荷蘭內戰，西班牙亦同時阻擾北荷蘭人經葡萄牙的海上航線進行海上貿易。北荷蘭人為求自保，打破對海上航道的阻撓，於1602年組成荷蘭東印度公司，得到商界及政界的支持，組成強大的航運部隊。當時荷蘭的海軍經費基本上靠自籌解決，主要來源是對進出港貨物徵收貨物稅，

以及對船隻徵收船稅。為回報納稅人及保證稅收的來源，荷蘭海軍便承擔着商船護航的任務。⁽⁹⁾16世紀早期荷蘭派出船隻到東方，而同時亦派出軍艦與商船輪替出洋，與葡萄牙的東方霸權展開角力。1596年荷蘭人把葡萄牙人驅離萬丹⁽¹⁰⁾(Bantam，即現在的雅加達)。荷蘭人進佔印度洋後更向東推進，1641年把葡萄牙人驅離日本，經過二十年的戰鬥，1658年荷蘭人控制了整個錫蘭(即現在的斯里蘭卡)以至南亞及日本的貿易，但無法直接染指中國龐大的貿易市場。

克拉克瓷名稱的來由

在16世紀明代末年，西方強行進入中國並打開了歷史新的一頁。葡萄牙人首先發現了繞過非洲南部好望角的東方航道，有紀錄記載第一艘到達中國的船隻屬葡人Raphael Perestrello，曾於1516年由馬六甲啟航，成功到達中國並帶回豐碩的成果。受這次的影響，葡萄牙人相繼由馬六甲組織船隊開往中國。⁽¹¹⁾

在16世紀下半葉，中國瓷器在歐洲是一種新產品，獲歐洲人青睞，但因價格昂貴，一般祇為皇室及貴族所享用。早期的瓷器產品主要是通過由中國、葡萄牙、西班牙及後來的荷蘭人的船隻運到東南亞；在東南亞分銷後，用船隻橫渡印度洋到歐洲或橫度太平洋再渡過大西洋到達巴西、墨西哥及歐洲等地。歐洲各國對中國瓷器的需求不斷增加，通過第三者作買賣已不合經濟原則，因此各國日趨迫切尋求直接與中國作交易。

在東印度地區的貿易中，葡萄牙與荷蘭之間常會相互攻擊，打沉或俘擄對方的船隻。1602年，一艘載滿中國瓷器的葡萄牙“聖地牙哥(São Tiago)”號船“Carrack”(“Carrack”是15世紀葡萄牙及西班牙人行駛遠洋的一種三桅帆船，其特點是能在大風浪中穩定行駛，船內有足夠空間承載貨物。)在荷蘭聖凱倫娜(Saint Helena)港被擄獲，船上的一切財產包括數千件瓷器於1603年在荷蘭的米德堡(Middelburg)被公開拍賣。兩年

之後，另一艘“聖達加達蓮娜(Santa Catarina)”號“Carrack”三桅船由澳門開航至馬六甲途中被荷蘭人俘掠開回荷蘭，船上數萬件瓷器(約60噸)在1604年公開拍賣，法國國王亨利四世買得了一套餐具。這次拍賣引起了特大轟動，數量如此驚人的青花瓷器在北歐地區出現尚屬首次。該批瓷器為青花釉下彩，特點是寬邊，盤、碗口沿繪分格及圓形開光的山水、人物、花卉、果實等。因荷蘭人從來沒有接觸過這種器物，因此祇沿用他們自己的稱謂“克拉克瓷(kraak)”。這名稱的出現有兩種說法：一說是根據葡萄牙人所使用的運載大量瓷器到歐洲的三桅船“carrack”的名稱而來；另一說是源於荷蘭文“kraken”一詞，即容易打破的意思。歐人在首次接觸這種開光的中國青花瓷器並不認識的情況下而用此兩種稱謂皆可接受，但前者較多人使用。

因歐洲市場對中國瓷器的需求量大增，大量訂單源源不絕經海路來到中國，“克拉克”青花瓷的大量外銷成為中國瓷器生產雙線發展的轉捩點：一為本身國內市場，二為歐洲及東南亞的市場。如前文法國傳教士所述：“外國人所訂製的外銷瓷並不合適中國人的口味。因此，在好一段長時間裡中國人對這些瓷種並沒有深入的研究及收藏，其中主要原因是不明白西方人的生活習慣及背景，加之外銷瓷產量大，相對於罕有的官窯而言，市場價值反而較低。

澳門作為中國早期貿易的轉口港

在明初，海外諸國來華入貢，隨船帶來附載物品與中國貿易。中國官員為了對外來者進行管理，設市舶司作統籌。市舶司初設於太倉、黃渡，後改設於寧波、泉州及廣州。寧波專掌管日本通商事宜，泉州掌管琉球通商事宜，廣州則掌管占城、暹羅、西洋諸國通商事宜。國外使者來華入貢時被安置在相應的驛館，福建的驛館稱為來遠，浙江的稱為安遠，廣東的稱為懷遠。⁽¹²⁾在中國早期並沒有開放市場作自由買賣的概念，祇

有朝貢制度，海外諸國來華有兩年一貢、三年一貢以至十年一貢等規定，對來貢的人數與船量加以限制，外國使者來華朝貢等事完畢後即命其返回原地，除朝貢以外帶來的其它物品可於驛館開市交易，但必須於三至五天內完成，外國使者往往以朝貢之名來華作買賣為實。入貢制度訂定海外諸國一年或三年甚至十年才准來華一次，遠遠不能滿足各地市場對中國物品的需求，因來華外商要求通商者逐年增加。因此市場需要及利之所致，非法買賣在中國沿岸更是屢禁不絕。

1510年葡萄牙人佔領印度果阿，翌年佔領馬六甲。葡萄牙人在馬六甲覬覦中國這個神秘而龐大的市場。1516年葡人拉斐爾·佩雷斯特雷洛(Raphael Perestrelo)由馬六甲啟航到達中國。1517年八艘船由葡人費爾南·佩雷茲·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率領抵達珠江口，其中四艘為葡萄牙船隻、四艘為馬來(Malay)船隻，其中六艘船隻停泊在聖約翰島(St. John Island)，其餘兩艘直航廣州⁽¹³⁾；其後葡人於屯門築室立寨，1521年被廣東政府所驅逐。從此，葡萄牙人的船隻沿着中國海岸如寧波、福州、廈門一帶進行非法買賣。⁽¹⁴⁾

1553年葡人藉詞借地晾曬水漬貢物為由請求登陸澳門半島，給了當地官員一些好處，使他們可以停留下來，在澳門建立居住點，允其每年向明朝政府交納地租，進而開發澳門港，使之成為向中國進行貿易的基地。此事在清嘉慶十七年的文件中有清楚說明，駐澳葡人每年須向清政府繳付租銀五百一十五兩作為租借澳門之用。⁽¹⁵⁾

葡萄牙人以澳門作為貿易基地，不擇手段排斥外來競爭者。荷蘭人於1622年曾試圖入侵澳門，但被澳門的葡萄牙駐軍以炮火擊退。⁽¹⁶⁾1802年英國人藉口防範法蘭西入侵澳門，派出四艘軍艦停泊近零丁洋海面，並欲派軍特強進駐澳門，葡萄牙人即稟報香山縣政府，由清政府派員強硬加以制止。⁽¹⁷⁾葡萄牙人用盡了一切手段排斥別國與中國做買賣，無形中壟斷了與中國貿易的市場。葡人在澳門的船隻載運貨物前往的地方包括

葡萄牙、西班牙、馬尼拉、帝汶及安南(即現在的越南)、印度的果亞和孟加拉、哥斯達(即非洲西岸的葡屬殖民地)等地。大部分船隻開往哥斯達，其次為菲律賓及果亞；船隻由東南亞載回貨物返澳門，再銷往內地。船隻之進出皆要登記科稅，在澳門額船祇納船鈔，免徵貨稅。⁽¹⁸⁾而以澳門作為根據地的船隻數量是有所限定的。根據《澳門紀略》卷上〈官守篇〉稱：“雍正三年(1725)定澳門夷船額數，從總督孔毓珣之請也。”孔毓珣說及洋人附居澳門有一段時間，得到朝廷恩賜包容，洋人才能安居樂業，但近來外來夷人漸多，為防滋事，限定在澳貿易船隻的數量。當時在澳舊有船隻十八艘，後自外國多購七艘，大小合共二十五艘。其時限制在澳夷人船隻數量為二十五艘，與以編號發給驗票，登記船上的一切資料，如船主、舵工、水手等人數，每當船隻出洋必須查實該船的登記資料，倘船上夾帶有違禁貨物或偷載中國人出洋者則治罪之。⁽¹⁹⁾限制葡人在澳船隻數量是為了更好地加以管理，避免因利益衝突而產生種種不利於澳門穩定發展的因素。

在早期，除額船外其它別國的船隻禁止進入澳門。按朝貢所訂定的例規，所有由廣東市舶司管屬的外國船隻必須前往廣州，當朝貢事宜結束後應立刻揚帆回國，如有個別船隻尚未清理賬項仍需逗留中國水域者，酌情准予碇泊澳門港口。⁽²⁰⁾由澳門到外洋的船隻卻沒有任何限制，因此澳門成為中國向歐洲的唯一出口港，一切洋人到廣州作買賣之後一定要返回澳門。乾隆十六年(1751)還規定洋婦嚴禁進入廣州，祇可停留在澳門。⁽²¹⁾貨物由廣州經虎門運出珠江口交給澳門的洋人或代理商，再包裝或轉運到十字門停泊的洋船或直接運往各地，因此澳門成了當年中國外貿重要的貨物中轉港。

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所收藏的清代澳門中文檔案粗略記載了澳門葡人船隻所載貨物，但並不全面。記載陶瓷的貨品祇用“粗瓷”或用廣東方言詞彙“缸瓦”通稱有關瓷器貨物，並沒有清晰的數量記載。在上述文獻中有如下一段記載：“嘉慶

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05年1月24日)，澳門註冊的第六號貨船，二十一日由澳門開往呂宋，因遇船身滲漏，原船返回澳門，該船十一月十五日開行，船上載有茶葉一百五十擔，粗瓷器一千子(扎)……”⁽²²⁾

澳門半島是由廣東省南部珠江口西岸向南延伸的一個長條形半島，三面環海，陸地面積有限。16世紀澳門半島面積約為2.74平方公里，17世紀增至2.83平方公里。當年的澳門半島主要分為南北兩部分，南部為葡人所租住的市集地帶，北部為原住民居住和耕種的地方。⁽²³⁾從16世紀到21世紀初，澳門的陸地面積擴大至9.3平方公里，差不多長了三倍之多，增加的陸地主要靠填海形成。[圖一]展示了1889年與2007年澳門地形比較，可以清楚看到，澳門的北面、東西兩側及南部地方，多年來因大幅填海增加土地，當年臨海的地方已不再近海，祇見陸地不斷向外拓展。當年的貿易船隻全從海上進入澳門，貨物上落地點主要在澳門東側及西側水域，稱為外港及內港。瑞典居澳的一位企業家、歷史學家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在1836年出版的著作《早期澳門史》裡談到船隻進入澳門的情況：“在經過娘媽角炮臺⁽²⁴⁾之後，進入內港，航道深度足以通過三百到四百噸的滿載貨物的船隻，但七百到八百噸的船隻則要在經過之前減輕負載始能通過。”⁽²⁵⁾外港及內港這兩個區域成為澳門商業貿易交通的重要樞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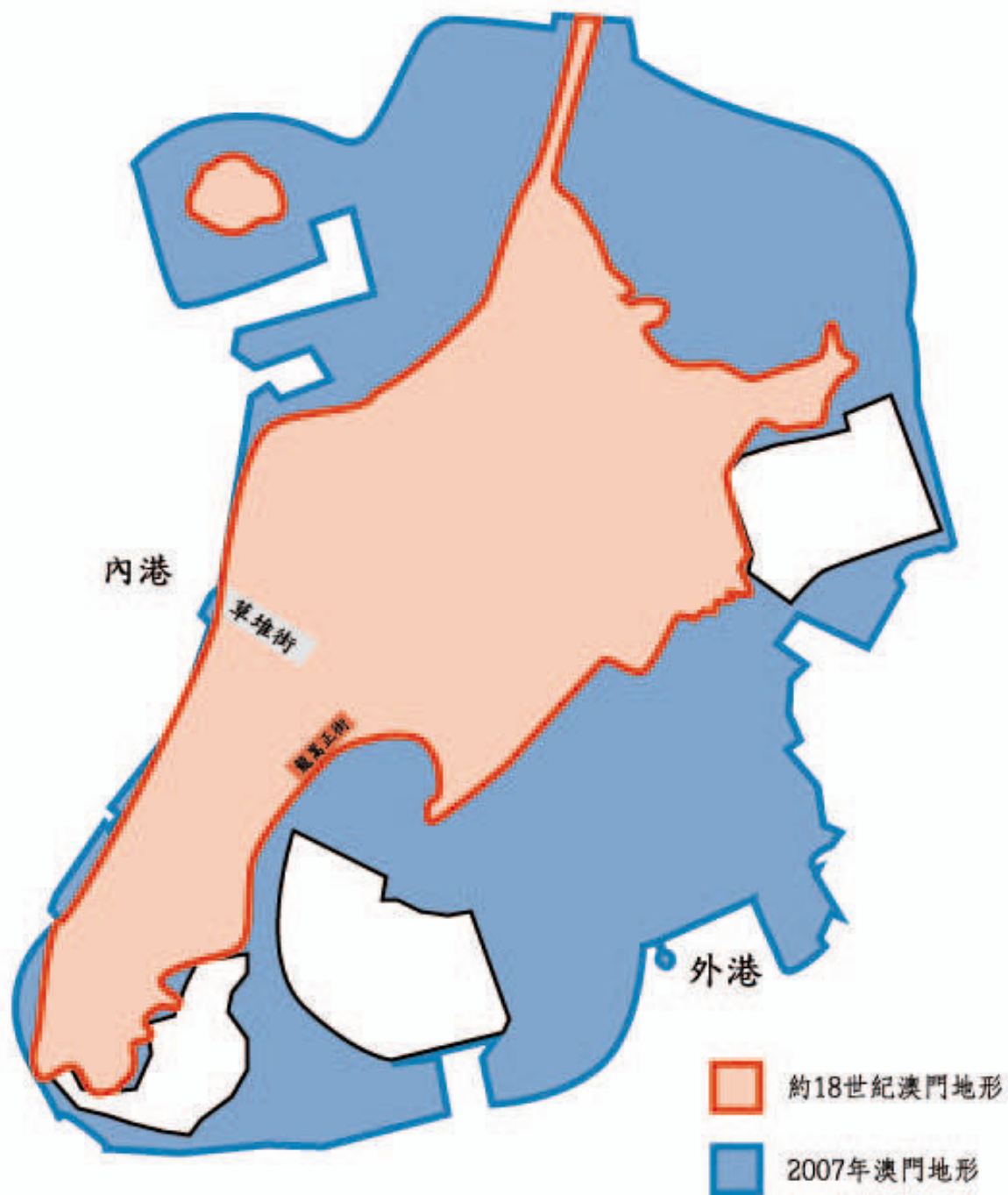
在澳門半島蒐集的瓷片

幾位澳門的陶瓷業餘愛好者2002年在內港老區([圖一]灰色位置)收集了一批瓷片，這些瓷片主要是明末的青花瓷。事因2002年澳門政府在內港一帶的老區進行下水道重整，把地層翻開，幾位瓷片愛好者路經此地撿拾所得不少破瓷殘件，相信泥土夾雜的瓷片為當年澳門增加陸地面積時從海上抽取泥土到岸邊作填土之用時的歷史殘留物。

篇末【附錄圖】中所列的三十件瓷片是在澳門老區搜集得來的。它們的共同特徵就是瓷片表面透明釉的顏色從微帶青色到灰白偏青，釉下青花則大多為程度不等的藍中帶灰色；從胎釉及工藝特徵上作分析，全部是為歐洲訂製而生產的出口瓷，以盤為主。在採集的樣本之中，有特定開光紋飾的青花瓷，可認定為西方所訂製的所謂“克拉克瓷”(kraak porcelain)。從該批瓷片的時代風格以及所繪圖案式樣判斷，應為明嘉靖至萬曆年間景德鎮的一種外銷瓷。這些有明確紋樣的外銷瓷器在近年打撈的17世紀荷蘭沉船中已大量發現。前述瓷片其中四件有底款。從瓷片盤的弧度可以計算出盤的尺寸，一般約為直徑20cm，最大的一件直徑約30cm[圖二]。樣本所繪的紋式多為草木花鳥山水人物等，為17-18世紀歐洲流行款式。所蒐集的瓷片中有部分為綾口盤，其中一件瓷片可與私人收藏的完美瓷盤作比較，相信是同一時期的產物。[圖三]

從搜集者的口中得知，曾在澳門不同的地區搜集到不同的陶瓷樣本，不同的區域所搜集到的瓷片年份亦不一樣，由明代晚年、清代早、中、晚期至民國期間皆可以從不同的地域找到。而其中約三千多件的瓷片已捐贈與澳門博物館，現在亦已在該館向公眾展示。而他現在手上還保留着小部分在2002年間所搜集的瓷片，搜集的地區主要在澳門的老商業區、舊日的老商業活動中心及當年臨海內港地域一帶。

現藏於澳門博物館的約三千多件瓷片，就是從澳門老區外港所屬地域尋獲的，是由前述其中一位瓷片愛好者所捐贈。該批瓷片發現的地方位於澳門中部一個小山坡上。1994年夏天，一場大雨過後，位於龍嵩街崗頂的一段約60-70英呎的小山包滑坡。一位瓷片愛好者在塌方附近居住，清理出倒塌泥土中夾雜的大量陶瓷碎片，主要為青花瓷片，亦有少量彩瓷。這位瓷片愛好者表示，他用了大約半年時間搜集了數拾筒⁽²⁶⁾約數千件瓷片，挖蒐手指頭不知破損了多少次；到了後期，他搜集瓷片的速度幾乎要與建築公司的推土



[圖一]約18世紀與21世紀初澳門地形變化比較圖



〔圖二〕從〔附圖11〕殘片所復原直徑約30cm的大碟



〔圖三〕〔附圖6〕的殘片與私人收藏的完好明朝萬曆年造的瓷碟比較圖

機械展開競賽，因建築公司開始維修塌方的小山坡。他說，當時發現近山坡邊沿的一段地方瓷片較多，中間則為石塊；從其堆積層看，表層以晚清至近代的瓷片為多，中層的石塊中沒有任何瓷片，下層的土壤中則夾雜着明末清初的瓷片，當中有大量海沙和大型貝殼等。查龍嵩街位於澳門南部海岸（圖一紅色部分），地處高地，約1584年（明嘉靖二七年）意大利天主教奧斯定修會來澳傳教，於1586年（明萬曆十四年）在崗頂（龍嵩街的山

坡上）興建教堂，名為奧斯定教堂〔圖四〕，三年後教堂歸葡萄牙人所有。此教堂亦為澳門最古老教堂之一。教堂於1825年重修，而於1994年倒塌的山坡正好是該教堂旁的花園部分〔圖五〕。在那裡拾獲的瓷片，大部分為明嘉靖至萬曆年間的产品，與教堂興建的時間相若，可信就是當時大量船隻運載貨物沿珠江南下到達澳門後在澳門裝卸時，遇有損破的器物被就地拋於海中；而在興建教堂時因需取土平整山坡，施工者就地取材，在附近



[圖四]位於龍嵩街的聖奧斯定教堂。黃色圍牆處為教堂後園。

海邊抽取海泥用作填土，因此在土層中發現大量海沙及貝殼中夾雜着數量不少的瓷片，而後來遇上塌方，這批沉睡在泥土中數百年的瓷片終於重見天日。

結語

澳門是中國早期對外貿易的一個窗口，從眾多的歷史文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6-17世紀澳門成為中西貿易的重要中轉站，這是不容置疑的。而在澳門所蒐集的這一批沉睡了數百年的瓷片就有顯著的時代特徵，所繪紋式有一定的範式，並以青花器為主，為當年歐洲人所喜愛的中國器物。這批瓷片為中西貿易提供了歷史文獻以外的實物見證，同時亦為針對明嘉靖到萬歷年間

景德鎮民窯外銷盜的研究提供了一批寶貴的實物資料。

【註】

- (1)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The first letter from Père d'Entrecolles, 頁202。
- (2) 〈明英宗實錄〉轉引自《中國陶瓷古籍集成》，頁16。
- (3) (7) 故宮博物院編《瑞典藏中國瓷》，頁56；頁43。
- (4) 《景德鎮陶瓷史稿》頁322。
- (5) 《台灣故宮文物月刊》264期，頁92。
- (6) 〈荷蘭印度公司與瓷器〉轉引自《中國陶瓷史》頁410。
- (8) *The Chinese Repository* 《中國叢報》，Vol. II from May 1833 to April, 1834，頁456。
- (9) 張健雄/編著《列國誌·荷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頁64。
- (10) 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圖五]當年聖奧斯定教堂後園倒塌的石牆及車道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Oxford. p. 3

(11) 龍思泰著《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出版，頁2。

(12) 王孝通著《中國商業史》，商務印書館出版，頁174。

(13) *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國叢報》，Vol. II from May 1833 to April, 1834，頁294。

(14) 龍思泰著《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出版，頁27。

(15)《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頁844。

(16) 思泰著《早期澳門史龍》，東方出版社出版，頁89。

(17)《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頁744。

(18)《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頁856。

(19) 趙春晨《澳門記略校注》澳門文化司署，1992，頁73。

(20)《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頁858。

(21) 李國榮、林偉森編《清代廣州十三行紀略》廣東人民出版社，頁46。

(22)《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頁199。

(23) 邢榮發著《明清澳門城市建築研究》，2007年10月出版，頁16。

(24) 筆者註：娘媽角炮臺即澳門半島南端媽祖廟旁的聖地牙哥炮臺。

(25) 龍思泰著《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出版，頁34。

(26) 筒是指有把手的圓形膠箱，約30 cm直徑 X 26 cm高。

【附圖說明】以下部分為從澳門老區所蒐集瓷片之排序並略加說明其特徵。圖1-2為1995年5月於龍嵩街採集，無底款。圖3-30為2002年12月於草堆街採集，其中圖6、7、11、14有底款，其餘皆無底款。



[圖1]

盤，克拉克款式，盤心繪松樹花果鹿紋，盤沿繪開光花卉。胎色潔白，青花發色帶灰。矮圈足，足內露胎及有砂粒。盤底有明顯跳刀紋。



[圖2]

盤，克拉克款式，盤心繪松樹花卉鹿紋，手法寫意，胎色潔白，青花發色帶灰。矮圈足，足內露胎及有砂粒。盤底有明顯跳刀紋。



[圖3]

盤，盤心以雙勾填濃淡青花繪山石海水紋，胎色潔白，青花發色明亮，胎色潔白。矮圈足，足內露胎及有砂粒。盤底無跳刀紋。



[圖4]

盤，克拉克款式。盤沿開光繪八寶及花草紋。青花發色鮮艷。胎色潔白，圈足內露胎及有砂粒。盤底有明顯跳刀紋。



[圖5]

盤，以雙勾繪單鳳朝陽，畫工寫意，青花發色及胎色潔白。圈足內露胎，有砂粒，盤底無明顯跳刀紋。



[圖6]

盤，以雙勾繪單鳳朝陽，畫工寫意，青花發色鮮艷，胎色潔白。圈足內露胎，有少量砂粒，盤底無明顯跳刀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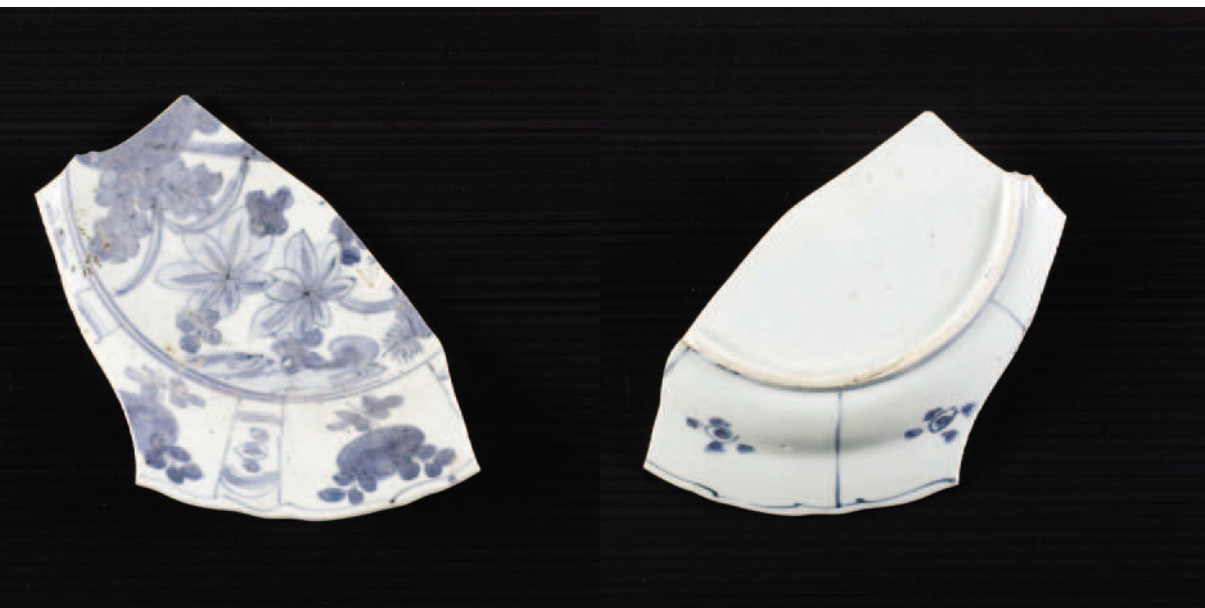
〔圖7〕

盤，盤心繪花草紋，畫工寫意，盤沿繪折枝花卉。青花發色明亮。胎色潔白，足內露胎，圈足有砂粒及盤底有明顯跳刀紋。



〔圖8〕

盤以雙勾繪山石、竹葉及鹿紋，畫工細利，清晰繪出鹿身的皮毛。青花發色良好，薄胎，胎色潔白，足內露胎，圈足有少許砂粒，盤底有明顯跳刀紋。



〔圖9〕

盤，克拉克款式，盤心繪花草紋，畫工寫意，盤沿繪開光折枝花卉。青花發色明亮及胎色潔白，足內露胎，盤底無明顯跳刀紋。



[圖10]

盤，克拉克款式，青花發色良好，胎色潔白，圈足內露胎及足有砂粒，盤底無明顯跳刀紋。



[圖11]

青花大盤，盤心以雙勾繪折枝蓮花紋，盤沿繪八寶及折枝花卉。盤外沿繪單圈祥雲飛鳳。青花發色良好，胎色潔白。矮圈足，足內露胎，圈足有砂粒及盤底有明顯跳刀紋，單圈款。（盤直徑約30 cm）



[圖12]

綾口盤，以雙勾繪竹石，盤沿繪山石花草，小鳥捕食，形態可愛。盤外繪折枝花卉，青花發色明艷，胎色潔白。矮圈足，足內露胎，圈足有砂粒及盤底無明顯跳刀紋。



[圖13]
罐蓋，繪雙勾填色圖案。胎厚重，青花發色帶灰及胎色帶青。



[圖14]
盤，以雙勾繪菊花，盤沿繪八寶。青花發色明亮及胎色潔白，足內露胎及有砂粒，盤底有明顯跳刀紋。



[圖15]
綾口盤，以雙勾繪單鳳朝陽，畫工寫意，青花發色鮮艷，胎色潔白，圈足內露胎及有少許砂粒，盤底有明顯跳刀紋。



[圖16]

盤，以雙勾繪單鳳朝陽，畫工寫意，胎色及青花帶灰。胎色潔白，圈足內露胎，盤底有砂粒及有明顯跳刀紋。



[圖17]

盤，盤沿以雙勾繪八寶及折枝花卉紋，畫工寫意，胎色潔白，青花帶灰。足內露胎，有砂粒及有明顯跳刀紋。盤外沿與圈足處有縮釉現象。



[圖18]

盤，盤沿以雙勾繪折枝花果，畫工寫意，盤心繪鹿及花草紋。胎色潔白及青花帶灰。足內露胎，圈足有砂粒及有明顯跳刀紋。盤外沿與圈足處有縮釉現象。



〔圖19〕

綾口盤，盤沿以雙勾繪山石花果雀鳥，盤心繪花草鳥紋。胎色潔白；青花帶灰。足內露胎，有砂粒及有明顯跳刀紋。盤外沿繪枝頭小鳥。



〔圖20〕

盤，盤心繪松樹。胎色潔白，青花發色明亮。足內露胎，有砂粒及無明顯跳刀紋。



〔圖21〕

盤，盤沿外折，淺弧壁，矮圈足，足內露胎。口沿繪荷塘鷺鳥，盤心雙圈繪山石城池、寶塔，旗幟飄揚，鳥兒飛翔空中，外壁繪折枝花果紋。胎色潔白，青花帶灰，圈足有砂粒，盤底無釉。



〔圖22〕

盤，盤心繪花果小鳥。胎色潔白，青花有濃淡之分。足內露胎，有砂粒及有明顯跳刀紋。



〔圖23〕

盤，克拉克款式，盤心繪山石樹木流水。胎色潔白；青花帶灰。足內露胎，有明顯跳刀紋。



〔圖24〕

盤，印模克拉克款式，胎色潔白，青花分濃淡。開光邊位及中間柱位突起。足內露胎，有砂粒，有明顯跳刀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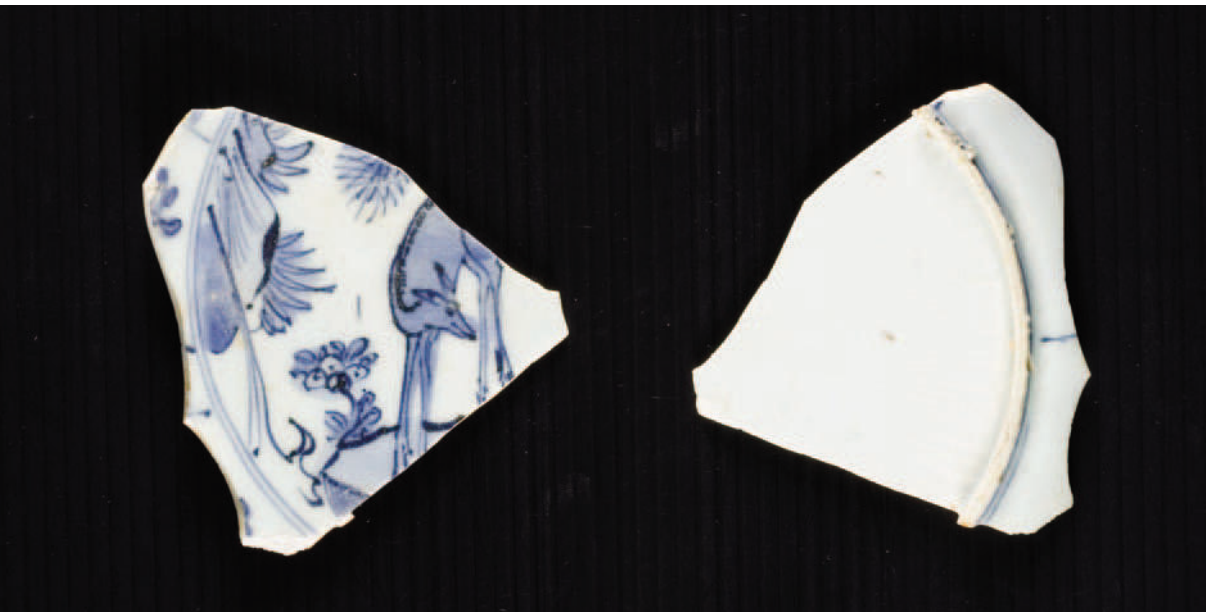
[圖25]
盤，克拉克款式，盤心繪荷花，青花濃淡有致，胎色潔白。足內露胎，圈足有砂粒。



[圖26]
盤，克拉克款式，盤心繪濃淡荷花，胎色潔白。足內露胎，有砂粒。有明顯跳刀紋。



[圖27]
綾口盤，克拉克款式，盤心繪青花濃淡花卉，胎色潔白。足內露胎，有砂粒。有明顯跳刀紋。



[圖28]

盤，克拉克款式，盤心繪松石鹿紋，胎色潔白。足內露胎，有砂粒。有明顯跳刀紋。



[圖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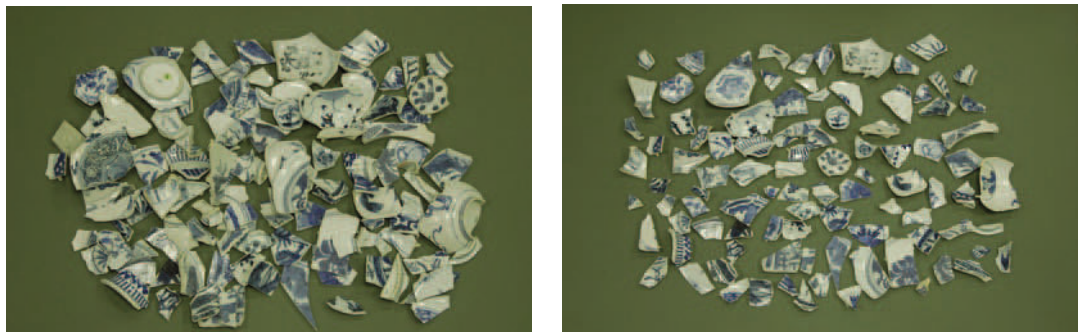
盤，盤心繪松鶴鹿紋，胎色潔白，青花發色帶灰。圈足繪波浪紋淡青花一周，足內露胎。有跳刀紋。



[圖30]

盤，以雙勾繪人物、小橋、山石海水，畫工寫意，盤沿繪荷塘及不同形態的白露。青花發色及胎色潔白。胎色潔白，足內露胎，無明顯跳刀紋。

【以下圖片由澳門博物館提供，為當年於龍嵩街聖奧斯定教堂後園倒塌石牆中所撿獲的一小部分瓷片及復原品，共有數千件並以克拉克瓷(kraak porcelain)為主。



現收藏於澳門博物館三千多件瓷片拍照的兩幀相片(澳門博物館提供)



用瓷片復原的“克拉克”瓷盤及碗(澳門博物館提供)

1-30號瓷片由潘國雄先生提供，其餘瓷片及復原品由澳門博物館提供，在此特別銘謝澳門博物館館長陳迎憲先生及趙維富先生。